

略談

翻印古書

林慶彰

據筆者所知，現有出版社中專門翻印古書的，約有二十多家，每年出書近千種，佔全國出版圖書總數的十分之一。這個比例，並不算很大。但是，古書的讀者除了國內人士外，大部份是外國的專家學者和學術機構。書翻印得好壞，關係國家聲譽至鉅。這是翻印古書者，所必須時時顧及的問題。筆者學的是中文，七八年來一直和古書為伍，發現翻印的古書中，有不少應該改進的缺點。其中，某些問題曾有學者討論過，但是出版者或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改進並不多。另一些則是筆者讀書時感到不便的。現在合併討論如下：

一、新編目錄和索引

古人所謂「目錄」，偏重在校讎字句，釐訂篇章，和現在這種以檢索內容為用的目錄，是不太相同的。由於著重在章句的考訂，這種檢索用的目錄，不是完全闕如，就是因陋就簡。大概的說，古書的目錄約可分為下列兩種形式：一、目錄在全書之前。這是大部份古書所採用的一種，但都失之簡略。如歷代名臣奏議一書，目錄祇有「卷一——五君德、卷六——九

聖學……」等類目，其中「君德」、「聖學」中，包括那些大臣的奏議，則完全沒有標出來。二、書前有簡目，詳目則分散在各卷或各類之前。如御選歷代詩餘一書，書前總目僅註明「卷一 六十調 詞一百八十八首」，在卷一才把六十調內所含的一百八十八首詞列出。這兩種目錄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都是不合要求的。其中以第二種目錄翻檢起來最為辛苦，如果碰到的是幾十卷以上的大書，要找出一篇詩文，可能會用掉大半天；萬一看滑了眼，又得重新再來，這樣再三反覆，時間是多麼的不經濟。又有些書，像新舊書合鈔、佩文齋詠物詩選等，編成後都要進呈皇帝的，因此，目錄之前都有「進呈表」、「參贊名氏」之類的表格，多者數十頁，少者也有十多頁。目錄被夾在表格和正文中間，找尋起來相當麻煩。

目前翻印的古書，大多僅知道將原書四面併成一面，以節省篇幅而已。能够在原目錄之前，加上新編目錄的實在不多見。這種新目錄對出版者來說，並不是一項很大的負擔，對讀者又是那麼有幫助，出版者何不從善如流呢？最近看到屈翼鵬（萬里）、劉兆祐兩先生主編的明清未刊稿彙編初輯，目錄的編排相當

考究，除於每部叢書前加弁言、敘錄外，並附有新編目錄，內頁則重新加排該部叢書頁碼，和全輯總頁碼，以作為將來編纂總索引之用。這種作法，可為出版界借鏡的地方很多。希望這種目錄上的加工工作能廣為出版界所接受。

國人有索引的觀念，大概是民國以後受西方圖書館學影響才有的，因此，古書中幾乎沒有一本真正有索引。近來出版的古書，有些已加編索引，但又僅限於叢書、類書一類的工具書。其實，工具書編索引固然重要，各種詩文總集、別集的索引，同樣不可忽略。有些出版者雖已注意到索引工作，但總是和目錄的觀念分不清楚，以致錯誤不時出現。一般來說，目錄都放在書前，按一書的篇章順序排列，讀者一打開目錄，即可知全書的梗概；索引則放在書後，用各種檢字法，把書中的篇章、人名或重要辭句貫穿起來，作為搜尋全書內容的輔助。可是，有很多出版者，對這種觀念並不很清楚。例如：漢魏叢書（新興）前的目錄，叫做「索隱」；八代詩選（廣文）在舊目錄之後，加編新目錄，叫做「篇目索引」；索引本詞律（廣文）的索引放在舊目錄之後，而不是書後。對這些能為讀

者方便著想的出版者，我們已相當的感激，要是能做得更合規格化，那就兩全其美了。

筆者最近看到日本明治書院所編的新釋漢文大系，像論語、孟子、老子、莊子之類的書，書前不但有目錄，書後更編有重要辭句索引。我們從事古籍今註今譯的，像商務、三民等，都忽略了索引工作。今後不論古書的今註今譯，或是翻印古書，都必要把索引工作建立起來，才能配合學術進步的要求。以今日圖書館科系畢業生之多，請幾個來編纂目錄、索引，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。

二、註明版本和翻印日期

常常在書上看到有關講究版本的文章，上課時，老師也時時強調讀書要重版本，版本的觀念也就深深的印在讀古書的人的腦海裏。可是，也因版本的觀念，買起書來礙手礙腳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書目答問補正所註明的版本，都是刊刻比較好的，要買古書泰半從這裏問津。以前筆者要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，把書目答問補正所註明的「殿版大字本」、「揚州小字本」、「廣州小字本」……等，統統抄下來，到了書店，

把那套書前後翻了幾次，還是不知道它是那一種版本。現在翻印的古書，大都患了這種來歷不明的毛病。

記得民國初年時，翻印的古書，在書名頁都記有根據某刻本翻印的字樣。例如百衲本二十四史，史記註明「上海涵芬樓影印南宋黃善夫刻本，原書板匡高二十公分，寬十二公分」；後漢書註明「上海涵芬樓影印宋紹興刊本，原闕五卷半，以北平國立圖書館元覆宋本配補」。這樣將一書版本的來龍去脈，說明的清清楚楚，讀者祇要把書打開，就知道它的虛實，無形中給讀者一種保證。可是，現在翻印的古書，幾乎都有和讀者「捉迷藏」的現象。像詩集傳（藝文）、四書集注（藝文）、廿二史考異（崇禎）、四庫全書總目（藝文）等大大小小的書，都是來歷不明。讀古書最講究版本，既然出版者標榜「海內外最佳善本」，就應該很忠實的把版本註明清楚，才是負責的做事態度。又很多出版者翻印古書時，喜歡以干支記年，如箋註王荊文公詩（廣文）註明「庚子春月廣文書局影印元大德刊本，辛亥仲春再版發行」，這樣做也許很風雅，可是讀者想知道「庚子」「辛亥」是那一年，還是要再查年代對照表，不但不方便，且徒增困擾。

我國古書的數量太多，如果讀者每求索一本書，都要自己考訂版本，或者要先讀有關該書版本考的文章，才敢安心的去買來讀，那該多麼辛苦。讀者要免除這道麻煩，祇要出版者多費點時間，把一本書的版本說明清楚，事情不就解決了嗎？當然出版者不全是目錄版本專家，要他們把版本交代清楚，似乎有點困難，但是，如果能充分的利用現有書目，或請教專家，這個問題應該不難解決。

又翻印的古書不但要註明版本，更要把出版的年月日註明出來。有些書祇標明「再版」、「台一版」的日期，初版或原版的日期則完全省略，這都不是一個負責的出版者所應有的態度。有些書是翻印民國初年的排印本的，也須把排印的底本和書局說明出來。即使是沒有違礙的，也應該在不傷大雅的範圍內，稍作說明。

三、適度縮印和改用精裝

古書的卷帙太浩繁，翻印時大半把它們四面拼成一面，像嘉慶重修一統志，共五百六十卷，線裝分成兩百冊，商務印書館把它縮印精裝，和索引才十一大

冊。古今圖書集成共有一萬卷，光緒十年上海圖書集成局鉛印本有一千六百二十八冊，分裝二〇一函。民國五十三年文星書店的翻印本，才只有一百冊。這種縮印，不但減少書所佔的空間，更減輕讀者金錢的負擔。可是有些小書，像廣文書局出版的荀子集解、莊子集解、淮南子、戰國策……等，縮小到必須隨身攜帶放大鏡，才能閱讀，則又是「矯枉過正」了。

大體說，四面併成一面的書，以十六開本最為適當，其他廿四、廿五、卅二等開本，字體都嫌太小。可惜，現有翻印的古書，採用十六開本的，除了幾套重要的經書和正史外，其他並不多見。像世界書局的兩漢三國學案、宋元學案補遺、清儒學案，文海出版社的明文稿等，都是廿五或卅二開本，字體又小又模糊，讀起來很傷目力。有時讀者和出版者間，很難相配合，這就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。

線裝書容易散失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，古人為了怕書散失，設有各種書函，有六面、四面型的，也有改良成夾板型的，但不論用那一種書函，都容易遭蛀蟲。古代的藏書家，對書函都沒什麼好感。像孫從添的藏書記要裝訂條說：「書套，不用為佳，用套，

必蛀。」筆者常到學校圖書館翻閱中華書局翻印的古今圖書集成，每次打開書函，都得把書蟲統統殺死，才肯放下心來看書。有些圖書館設有殺菌室，定期把書送進去殺蟲，似乎還可稍稍避免蟲蛀的危險，沒殺菌室或設備欠佳的，書函恰恰成爲蛀蟲繁殖的溫床。

另外，線裝書在編目、排架、清點時，也很不方便。而且直立的排，日子久了以後，書本變得彎彎曲曲，宛如「風漬書」。又沒有書函的線裝書，一部數十卷或數百卷，排在架上黑壓壓的好幾層，讀者已很少有興趣把它取下來看看的，要是再用函裝起來，會動手把它們打開的，將是更少。據外國回來的人說，美國的圖書館並不喜歡線裝書，如果有精裝的，他們一定買精裝本，線裝本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買的。

既然線裝書和書函有那麼多缺點，我們的出版者應該儘量少用爲是；可是，像明清史料、百部叢書集成、景印四部善本叢刊、無求齋論語集成、孟子集成等大書，仍舊是用線裝或書函，真叫人費解？以今日印刷技術之發達，幾乎所有各種形式的古書，像竹簡、帛書、卷軸等，都可翻成精裝本，出版者又何必拘泥於線裝的形式呢？有人說線裝可保存古書的形式，但是如果光爲了要求形式的擬似，而忘了它對圖書

館或讀者的實用價值，則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了。

四、有系統的翻印和整理

翻印古書，不僅是把它們翻印出來而已，而是要知道那些書值得印。有時，出版者和學術界對一本書的價值，觀點並不相同。出版者以營利爲第一，因此，一些基本的書大家爭相翻印，較冷門的書，則乏人問津。學術界所需要的，則是罕見的秘本，或是流傳外國的孤本，是着重在研究上的功用。現在，有不少出版者，不計贏虧的翻印和整理冷門書，精神是相當可佩的。但是，範圍並不够廣，例如一向爲國人忽視的戲曲書，除了元曲選、六十種曲、孤本元明雜劇、盛明雜劇和全元雜劇初、二、三、外編外，就沒有出版者再下功夫蒐集過。如果有人肯用心編成全明雜劇、全明傳奇、全清雜劇、全清傳奇，對研究戲曲的人來說，真是一大貢獻。

除了把各類的書搜集整理出版外，還要對每一本書的內容作徹底的整理。很多古書，如章回小說、戲曲等，其內容價值要強過時下通行的言情、武俠小說好多倍，可是一般人寧願蹲在租書攤，也不願讀古書。其中原因，文字較不習慣外，最大的阻礙，恐怕是

古書沒有標點分段，讀者不容易接受。如果能把這些書重新排版，加以新式標點符號，則購買的人必大量增加。現在有一兩家書店在做這種工作，可是進度太慢，影響力不大。

不但小說、戲曲的書要整理，就是其他古書，也都必須加上標點符號，現在很多書店翻印的新校本資治通鑑、續資治通鑑、明通鑑、廿五史等，似乎都不算我們出版者的成就。筆者認為，與其爲了翻印這些書而和人打官司，或受到處分，倒不如腳踏實地的下點功夫，整理一些別人沒整理過的書。例如十三經注

疏、十通等等，都是學文史的人必備的，如果有出版者願意加以標點，那該是多好。

五、結論

我們翻印古書的風氣，受世界各國重視漢學的影響，將會越來越興盛。上面所提到的問題，出版者如果能和學術界相配合，逐步加以改進，不但國內讀古書的人士感到方便，就是外國的專家、學者和學術機構也爭相稱美，所謂「漢學中心」也就無形中慢慢形成，根本不必大家聲嘶力竭的鼓吹。

「冷眼冷語」序

陳 冷

本書所蒐集的短文，大多全在六十二、六十三年間寫成的。那時我負責高雄新成立的「臺灣時報」副刊編務，報紙副刊的慣例少不了「方塊」，而時報乍成立，財務困難，臺灣副刊稿費時有拖欠，「方家」在無言抗議之下，常置催稿信於不顧，稿源乃常無以為繼。爲了避免報紙開天窗，身爲主編乃不得已趕一篇湊數；是時也，樓下檢字工人頻頻催稿，樓上我揮汗如雨的趕寫，成文倉猝草率在所難免。因此，文成便戲名曰「不得已集」，實在是「予豈好『方』哉，予不得已」也。

蒙呂秀蓮女士一番好意，要爲女作家——尤其是女方家出專集，濫竽充數的「不得已集」就如此這般結集成書了。文集中所談內容十分龐雜，且部份內容係針砭時弊之作，今日看來頗有「事過境遷」之憾；然「事雖過」，問題大抵仍存在，事後再讀亦別有一番滋味。只是當時猶「年輕」氣盛，下筆常不免莽撞火爆。冷人，冷言，冷語，尚請讀者多多包涵。